

# 新旗

第十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 如何解決中國危機 舒嚴

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大會，二星期後就要閉會了；國民黨軍攻下張家口後，共產黨也將聲明談判全盤破裂了。現在，在所謂『第三方面』調停之下，尚有雙方妥協的一縷希望。不過無論妥協與否，無論是和是戰，中國危機仍然是不能解決的。因為如此深刻的危機，非廣大羣衆自己起來解決，任何人都無法解決的。

不幸，這個真理未爲人們所認識。人們寄託解決之希望於廣大羣衆以外。起初，人們寄託於國共兩黨自身，希望兩黨直接談判可以達到目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親來重慶，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直接談判一二個月，沒有得到結果。以後，人們寄託於美國，希望這位娘舅來調解家務糾紛。五星上將馬歇爾來做公斷人已有十個月，也是沒有得到結果。

現在，人們又寄託於美英蘇三國共同的調解了。正在美國調解顯然失敗的時候，國際間紛紛傳說去年波茨坦會議時三巨頭關於中國有秘密的協定，其中含有『強迫中國政府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而不解散中共原有之軍隊』條文，而且規定由美國負責使中國執行，美國若未能辦到，則蘇聯可以自由行動，單獨負責。美國國務院中國科雖然否認這個傳說，但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先例，以及過去一年來談判情形看來，波茨坦三巨頭會議有此秘密協定是很可信的。那麼，人們希望，次一步，也許是美國一國調解讓位於美英蘇三國調解了。

僅僅兩黨直接交涉，已經離開真正的解決方法了；由兩黨直接交涉，到美國一國調解，離開得更遠些；由一國調解，到三國調解，離開得更遠些。所以，無論波茨坦有無秘密協定，無論蘇聯和英

國有無出面干涉之意，中國危機之不得解決是可以斷言的。

經過無數次打擊以後，我們還不覺悟麼？還不明白過去是愈走愈遠離真正道路麼？

現在中國危機，不是通常的危機，乃是革命的危機，乃是幾世紀積累下來的歷史矛盾之總爆發，非用革命手段決不能解決的。但既然是革命，那首先是廣大羣衆底事情，尤其是大城市羣衆底事情，決不是國共兩黨或美國一國或美英蘇三國底事情。人們輕視大城市羣衆底力量，人們不去喚起羣衆，而寄託希望於羣衆以外的力量，尤其外國底調解，難怪同理絲一般，愈理愈紛亂了。

根本解決危機的方法，就是停止召集『國民大會』和『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頒佈新的選舉法，選舉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真正的國民大會，同時還給民衆以種種應享的自由。一切問題，連國家

### 第十期目錄

如何解決中國危機.....	舒嚴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蘭因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下) Ernest Germain	唐盛
大戰後的蘇聯.....	劉默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上).....	舒嚴
中國經濟發展走甚麼路線?.....	舒嚴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形式和政府組織問題在內，由國民大會去決定。將來即使國民大會仍然不能解決這過於深刻的危機，至少也是向着解決前進一大步，不像現在之南轅北轍了。

總之，廣大羣衆，尤其大城市羣衆，如果沒有興起，沒有以自己力量直接干涉國家大政，則無論何種解決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或靠不住的。而現在喚起羣衆的比較最適當的手段就是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

起來，反對一黨指定的，或數黨分配的國民大會，要求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

###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蘭因

作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底根本大法，法國新憲法，已於本月十三日由公民表決通過了。現在祇待依照這新憲法成立正式的政制，第四共和國政制。

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於一八七五年，由此憲法正式成立的政治到了一九四〇年希特勒政陷巴黎後告終。現在有了第四共和國，但能支持多少年呢？能像第三共和國一般長壽呢？還是像第一共和國（一七九二——一八〇四）和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一八五二）一般短命呢？或更短命些？

我們試回溯法國「解放」以來，以憲法為中心的政治鬥爭。

去年十月，法國選出了第一次制憲會議，共產黨佔據第一黨位置，社會黨次之，人民共和運動又次之。臨時總統戴高樂爲了起草憲法問題，與制憲會議中佔多數的黨派發生衝突，憤而辭職，制憲會議選舉社會黨領袖古查代替他。但起草的憲法於今年五月舉行公民表決時，被否決了。戴高樂所屬的黨，人民共和運動，在這半年來努力增長得很迅速

，號召公民反對這個憲法。

今年六月，選出了第二次制憲會議，資產階級底人民共和運動從第三黨地位一躍而爲第一黨地位了，牠的領袖皮杜爾代替古查做臨時總統了，新的制憲會議議就人民共和運動要求，重新起草憲法，雖與舊的憲法不同，但仍未能符合戴高樂底願望。戴高樂要求的主要是擴大總統權力和兩院制。新憲法僅採用了兩院制，而未曾擴大總統權力，所以表決以前，戴高樂號召國人投反對票。但是人民共和運動中皮杜爾一派是贊成新憲法的。此次投票結果，新憲法終於通過了。

法國政治危機從此解決了麼？還早得很！

爲憲法的鬥爭是階級鬥爭一個部分，但并非決定一切的部分。第三共和國憲法所以能施行六十七年長久，是因為憲法通過以前，法國階級鬥爭已因巴黎公盟失敗而告一段落，憲法不過是反映這已經確定的局勢而已。但是現在，法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尚未會進入於決勝負的階段。第四共和國憲法，與第三共和國憲法相反，并非階級鬥爭告一段落後的產物，而是當前階級鬥爭底一種插話，不僅不會結束鬥爭，反而要更加推動鬥爭的。大門爭還在前面哩！

第四共和國政制之不能穩定，我們已經可以從此次公民表決看得出來了。首先，贊成票比反對票多得有餘，贊成票僅佔全體票數百分之五三·六，反對票也佔到百分之四六·四。反一句話說，法國公民幾乎有一半的人反對新憲法的。其次，棄權的公民增加了。五月表決時投票的有一千九百八十八萬人，此次祇有一千七百十萬人，棄權的上次佔百分之二〇，此次則佔百分之三〇了。在如此情形之下，通過的憲法重加修正，也是可能的。如此，連爲憲法的鬥爭也是未曾終結的。

在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之下，法國無產階級大多數是投票贊成新憲法的。但這祇能說明改良主義在法國工人中保有如何大的影響罷了。

有人以爲新憲法中規定工人有加入工會和參加管理生產等權利，總比第三共和國憲法或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憲法好些，總是值得工人贊成的。這是改良主義的看法。

革命者并不排斥改良，但在政權問題上，在憲法問題上，是沒有改良可言的。沒有甚麼代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的政權，同樣也沒有甚麼代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的憲法。不僅憲法中參加若干工人權利，沒有改變其資產階級性質，即使把蘇維埃制度合併到議會制度去，如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後改良主義者希爾費丁所擬訂的，其資產階級性質也是沒有改變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起後，大家忙於宣佈共和國時，有個革命報紙說道：『現在是革命問題，不是共和國問題。』這話，不僅對一八四八年的法國說是對的，對現在的法國說也是對的。現在法國無產階級遇到的問題，是如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問題，而不是如何在資產階級憲法中添加若干工人權利問題。工人權利，我們是需要中的，但資產階級憲法，長時期政制所根據的根本大法，則無論其中含有多少工人權利，我們都不能投贊成票，祇能投反對票。革命的工人投反對票，與戴高樂派反動分子投反對票，表面上雖是一樣，但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法國即將根據新憲法，於十一月十日選舉正式的國會，正式的總統，并成立正式的政府了。政治的鬥爭不久又要以此選舉為中心而爆發出來。我們希望法國無產階級能在此選舉中解除改良主義的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

## 無產階級填補『真空』

但是羣衆底覺悟雖然低於一九一八年，羣衆底經驗則高於一九一八年。『戰爭和法西斯所剪斷的線索，羣衆於其剪斷之處連接起來。』過去鬥爭之最進步的形式，從此不成爲鬥爭終點了，而成爲現時期羣衆行動底出發點了。這點在意大利表現得最明顯；那裏，鬥爭是從『蘇維埃』和『兵士代表會』之成立及羣衆之武裝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四個年頭的革命鬥爭當中尚未能採取這種形式，或僅能零星地採取這種形式。以前羣衆是很難明白武裝需要的，以前西歐革命鬥爭底主要障礙，這也是一個；但現在，在客觀條件逼迫之下，這個障礙忽然消失了。此事實也是羣衆經驗較高之證明。

主觀因素之缺乏，革命黨之異常無力，當然致使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領袖們能够加深這個經驗成熟和覺悟不足之間的鴻溝。這些領袖們限制了鬥爭底目標（『驅逐外敵』『國家復興』『政治民主化』等等），以此來壓迫羣衆所懷抱的超出資產階級社會框殼以外的願望。他們沿着這條道路努力把羣衆拉回到更『妥適的』鬥爭形式去，……或

脆勸說羣衆不必鬥爭！

然而這些反革命領袖所以能够施行那種惡毒的影響，那種影響所以能够廣播而具有決定性，祇因事變本身對他們有利。這是主要的因素。我們分析了羣衆鬥爭形式，其起源及其社會性質之後，現在回到我們的出發點來，即：鬥爭底規模小，又不互相協調。最後分析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因素，反革命干涉（英美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蘇維埃官僚，工賊領袖）才能得到如此之高的效驗。要明白這中間的作用，我們必須尋出羣衆發動底出發點。

這個出發點是不難尋出的。事實上，無論何處，羣衆發動差不多都是開始於德國軍事機構已經撤退或瓦解，而英美軍事機構尚未到來或離開這個階段中間。此時『人和事』之治理上留下一個『真空』，而羣衆表示一種傾向，要建立自己的機構來自動填補這個『真空』。

在捷克和意大利，從德國潰敗到資產階級中央政府建立，共有好多天距離，所以能够形成一種更鞏固的雙權政制。在巴黎，則祇有二十四個鐘頭距離，所以祇能形成一種雙權政制底核心。一九四四年八月間作戰期內，凡聯合國軍隊過境不停之處，羣衆自治機構維持得最久，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邱吉爾就是如此瞭解問題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宣告道：

『我會請他（羅斯福總統）注意這個事實，即德國政權從雅典撤退到有組織政府建立於雅典，這中間若是距離得太長久，EAM和極端派共產黨人多半要佔領雅典的。……』

這裏說的，不僅是關於某一事件，而且是關於資本主義腐朽社會內在最基本傾向之一。無產階級，不管其覺悟程度如何，爲客觀條件所逼迫，勢不能不努力把社會領導權抓在自己手裏。近三十年的歷史不是別的，正是無產階級努力要負起這個歷史使命而未能成功的後果。這種努力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爲沒有合適的革命黨來領導他。那麼，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之下，即在沒有穩固的資產階級政權之下，這個根本的傾向首先表現出來，也有甚麼奇怪的呢？他方面，各個國家這種『真空』發生不同的時間，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容易預見着，在全家缺乏國際無產階級有力的領導機關條件之下，甚至缺乏一個莊重的領導機關之下，暴動總要帶着孤立的和片段的性質，以此幫助了各種反革命進行其工作。要把運動抬高至普遍的水平，至歐洲的規模，則必須有個普遍化因素。在事實發生以前好久，我們就認爲惟有德國革命才能供給這個普遍化因素。所以歐洲各地雙權政制零碎產生，而且比我們所料想的更快些被人撲滅，——其基本的

原因正是在於沒有德國革命。

## 歐洲革命之第一階段 (下)

Ernest Germain

德國無產階級是完全消極的麼？

德國沒有革命，乃是事變沒有依照我們預料般發生之主要的原因。此點，所以必須仔細分析，在事實光照之下來分析，而非在『國際』內這傾向或那傾向所預先設定的圖式下來分析。

首先必須正確提出問題。很令人驚訝的，即是凡對此問題發言的人都以一種意見爲出發點，而此意見在事實光照之下是不能立足的。這就是說人們一致認爲：當納粹機構瓦解時，德國無產階級『消極地』袖手旁觀。現在，我們還不能給無產階級部分的行動劃一筆總帳。但我們所知的事實已經足夠摧毀那關於德國無產階級完全消極的意見了。人們說，經過法西斯十二年專政之後，德國無產階級底『階級覺悟』已經『耗竭』了，所以消極旁觀。可是我們知道，在俄國佔領區，『及其他地方』，如倫敦『經濟學家』所報告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納粹政權瓦解之後有社會革命精神的示威發生。工人佔領工廠，同納粹或附和納粹的經理人員算帳。同類事情也會發生於魯爾區。』

# 大戰後的蘇聯

唐 威

在歷史提出的各種問題中，關於蘇聯的問題可說是意見最分歧的了。關於其他問題，自然也有分歧的意見，甚至有更多分歧的意見，但這些意見分歧，是直接間接與關於蘇聯問題的意見分歧有關係的。最後分析起來，革命陣營中，對於蘇聯的認識不同往往決定了對於其他問題的認識不同。所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注視蘇聯底發展，時時刻刻檢查我們對於蘇聯的認識。經過了此次大戰，如此重大的事變，以後，蘇聯究竟變成怎麼樣了呢？這是每個人必然要問的。

## 我們對於蘇聯的認識

我們一向怎樣認識蘇聯呢？

蘇聯并非社會主義的國家，牠未曾建設好社會主義，以一國之力牠而且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

建設社會主義，乃是全世界各國底共同工作，至少若干重要的先進國家底共同工作。一個國家，無論領土如何廣大，人口如何眾多，資源如何豐富，是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即使有了無產階級專政，即使銀行，工廠，礦山，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具，土地，以及對外貿易權，都收歸國家所有，這個國家仍是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因為以上那些不過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罷了，若是缺少經濟的前提，若是沒有有計劃的國際分工（至少若干先進國家間的有計劃的分工）把社會勞動力量提高到現在資本主義達到的水準以上，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一個國家革命成功是可以獲得的，但經濟前提則非至少若干先進國家革命成功不能獲得。

以上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見解，乃是蘇聯創造者列甫和托洛次基二底共同見解，而且是其他領袖（連史大林在內）底共同見解。一九二四年春天，史大林講演『列甫主義問題』時，還是這麼說的。『列甫主義問題』初版明白寫着：非各先進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可是，同年秋天，史大林改變意見了，他提出了新的理論，即『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為在蘇聯，連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前提也是足夠的。從此以後，關於蘇聯底根本路線，就形成了兩個主要營壘。

一方面，從『一國社會主義論』出發，認為蘇聯關起門來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了，所以放棄了世界革命，將蘇聯國家利益置於一切之上，結果不僅社會主義建設不成功，連蘇聯國家，連十月革命遺產，也陷於危險了。

他方面，從『世界革命論』出發，認為十月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底發端，俄國無產階級既然奪得了政權，就應當以國家力量發動和促進其他國家底革命，不僅社會主義能夠由此建設起來，而且蘇聯國家也祇有如此才能夠維持存在。

我們是屬於後一種主張。

我們知道，當紅軍快來到時，默克倫堡的農業工人曾奪取了他們幾百年來所想念的土地。我們知道，同時薩克遜邦工人也曾豎起紅旗在他們的工廠屋頂上，而且選出了名副其實的蘇維埃。（比利時托派中有一個工人會參加一個工廠委員會，那是當俄國軍隊開入德勒斯登時選出的。此委員會中還有好多左派共產黨人，他們是反對史大林主義的。）我們知道，地方性的國內戰爭差不多到處都有發生，即一邊是US和另一邊是Volkskämpfer 或國防軍之間的戰爭。我們知道，一九四三年，漢堡已有一次暴動被鎮壓下去，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我們知道，當納粹機構崩潰時，帝國主義軍隊和蘇維埃官僚軍隊就於全國各部分設立更鞏固的而且同樣殘酷的警察機構了。在以上種種條件之下說來，我們還要把德國無產階級底勇敢態度稱為『普通消極』，那是真正可恥的。

他方面，德國沒有發生多少普遍性的行動，也是很顯然的。人們拿兩種理由來解釋這個事實。一部分人把德國沒有革命，歸咎於主觀的因素，即說經過法西斯十二年專政後，工人完全沒有組織，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陷於瓦解』。另一部分人則歸咎於客觀的因素。我們先來檢討這第二種理由，然後才能證明連第一種理由也是錯誤的。

## 德國沒有革命之客觀的原因

帝國主義戰爭終結時能爆發革命，其客觀的前提約有下面數種：社會矛盾加劇（無產階級集中化，其在全國收入中所佔部分愈來愈少，等等），戰爭影響增加貧困和破壞，後方和前方士氣頹喪，軍事，警察，國家機構瓦解等等。這些前提并非突然發生的，而是好多因素所影響的整個過程之產物。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結果人心愈來愈怨望了，士氣

## 戰後蘇聯地位比前強固了麼？

現在蘇聯執政的人，是屬於前一種主張。他們在戰前就宣布：蘇聯一國『社會主義』已經建設成功了，已經開始踏進『共產主義』階段了。戰後，蘇聯得到了勝利，擴大了領土和勢力範圍，抬高了國際地位，執政的人及其隨從者更加誇耀其成功了。看哪，無需世界革命，蘇聯仍能愈來愈加強大了。

蘇聯果真比前強大了麼？國際地位底抬高，領土和勢力範圍底擴大，不是表面現象的麼？事實上，蘇聯不是比前更加削弱，更陷於危險了麼？我們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試分內外兩方面來說明。

從外的方面說，蘇聯現在已陷於帝國主義底完全包围中了。以前國境周圍固然也是帝國主義勢力，但那是五六國帝國主義底勢力，牠們中間利害衝突非常厲害，不能團結一致來進攻蘇聯，蘇聯反而可以利用牠們中間的矛盾，以維持自己存在，而且相當擴充自己力量，但現在則包围蘇聯的，是美國一國帝國主義了，英國帝國主義做美國帝國主義底助手，但完全聽命於美國。

大戰後期，即德國失敗形勢已定時候起，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便以對蘇為中心了，一方面從外面建立基地，包围蘇聯，一方面設法破壞蘇聯社會基礎。戰後一年多，所有重大的國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與美蘇鬥爭有關的，而此鬥爭又都與美國包围蘇聯有關。

超空堡壘出現之後，北極海已經不是安全防線了。海對邊是格陵蘭，加拿大，阿拉斯加。格陵蘭已從丹麥之手轉入美國之手了，美國在那裏設了軍事基地；加拿大與美國聯防，那裏的軍事基地可供美國使用；阿拉斯加是美國自己的領土，美國在那裏的軍事建設更不遺餘力。

在西歐，德意二國，英美都駐有重兵。在南歐，希臘問題，特里斯特港問題，紅軍佔領諸國政制問題，鬧的是甚麼呢，倘若不是為了包围蘇聯。

在西亞，伊期問題，全體阿拉伯國家問題，轆轤海峽問題，也是英美為了包围蘇聯需要而激起來的。在東亞，則美國已經管制了日本，南鮮，華北，南滿，中國諸海港，更不必說太平洋所有戰略基地了。

過去蘇聯各方面邊境所遇到的是不同的敵人，現在則處處遇到美英聯軍及其附庸軍隊了。過去二十八年來帝國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大包围，終於在此次蘇聯戰勝之後實現出來了。過去蘇聯還可以在外交上要手段，聯合這幾個帝國主義反對那幾個帝國主義，或聯合那幾個帝國主義反對這幾個帝國主義，可是從此以後不能再要外交手段了，再沒有他系的帝國主義可以聯合了。從這一點說來，可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現在是比以前各時代都更重大的。

從內的方面說，戰爭也加強了經濟上那些『親資本主義的』因素，即加強了那些因素，牠們是敵視蘇聯那種從十月革命繼承下來的經濟基礎的。

這種親資本主義的傾向尤其表現在農業方面。在淪陷區，拽引機及其他農業機械被德國人搶去了，土地被德國人分了，經濟組織混亂了，以致集體化底物質的和精神的基礎受了損害，至今解放了以後，仍舊流行着個人耕種方式。富農分子抬起頭來。其他未曾淪陷的區域，則爲了必需品底缺少，黑市底猖獗，投

愈來愈頹喪了，羣衆愈來愈反對戰爭和政制了。羣衆欲得仇人而甘心；他們的仇恨表現於無量數偶發事件上；他們試操統治機權底抵抗力，經過一連串的經驗之後就將他們的力彙集中在直接任務上，即推翻現政府而結束戰爭。

凡是每月不斷地留心德國軍隊和德國無產階級情緒變化的人，一定能看出，德國，從史大林格拉失敗以後到意大利革命和諾曼狄登陸以前，確實發生了這個過程。革命思想迅速傳播，兵士和工人熱烈接受革命思想，一家德國工人報紙祕密出版，小抗議運動日益滋生，工廠罷工（大多數爲了糧食）愈來愈多，——這一切表明了羣衆情緒大體上同一九一六年俄國和一九四二年意國一般。

這許多零碎的運動要能匯合爲一個更廣泛的運動，需有一個補充的因素，即鎮壓機權底削弱。但是當各種條件配合起來最有利於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時候，鎮壓機權並沒有削弱。大多數德國軍隊，無論在歐洲海岸或內地，并未會戰敗。英美空軍轟炸并未能瓦解行政生活。納粹黨仍舊堅固地操持着統制權，蓋世太保仍舊在其權力底頂端，雖然『工作』過重，負擔不起了。

但是從此時起，即從羣衆情緒『最成熟』能發動革命時起，亦即從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過程突然轉變爲其反對面了。以前一切因素，有利於革命底客觀前提之成熟了的，從此開始破壞這些前提了。空軍轟炸，到某一程度可以使羣衆失去麻木狀態醒轉來，使他們脫出其個人願慮之狹小圈子，使他們明白種種艱苦具有政治性質，必須求得政治解決。但是過此程度，則空軍轟炸反而要陷羣衆於頹喪，使他們脫出社會生活，使他們墜入於最可悲的身心消沉中，使他們變成爲一羣孤立的個人之屬合，每人祇爲一己生存去鬥爭。軍事發展和失敗造成的緊張

機底普遍，已經造成了條件，使集體農場內部產生一個新的剝削階層。好多農民居然能够積蓄了幾十萬以至幾百萬羅布。富農底『獨立』精神跟着財產增加而增加。許多集體農場不肯生產國家指定的數額，甚至不肯將生產品交付於國家，這就是開始脫離蘇維埃經濟而獨立。

在戰中，國家無法奈何這種獨立精神，祇好讓步，甚至修改法律以取悅於富農。例如一九四五年五月，政府頒布一個命令修改遺產法。馬克思說過：『遺產乃是生產機關私有制社會底經濟組織之法律的反映。』所以蘇維埃政府成立初年就命令廢除遺產。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命令宣布廢除遺產，但爲了救濟殘廢者和未成年者底生活，暫時允許一萬金羅布以下的財產可以遺留給死者直系親屬，即死者底未成年兒女或孫兒女或曾孫兒女，以及未亡的配偶和殘廢的家庭成員。僅僅上舉的人有資格接受遺產。超過一萬金羅布以上的財產則屬於國家所有。採取新經濟政策以後，以上的暫時手段遂變爲長久的法律了。（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命令。）官僚當政以後，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有命令取消一萬金羅布之限制，但仍以遺留給上述直系親屬爲限。到了此次，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則廢除『未成年』之限制了，凡直系親屬都能接受遺產，若無直系親屬，死者底兄弟姊妹亦能接受遺產。此外，死者又能預立遺囑，於無親屬時，將其財產遺贈於『任何人』，即不僅遠親，凡不相干的人都能接受遺產了。這已經同資本主義國家遺產法一樣了。遺產底合法化自然要加強資本主義傾向。

不僅農業如此，工業亦然。在戰爭期中，工業沒有一個預先定好的計劃。在重工業方面，結果是那些國家托辣斯愈來愈加獨立，愈來愈加傾向於不徵詢中央機關而私自訂立契約。在輕工業方面，則是愈來愈減少集中化，地方當局指揮輕工業生產當地需要的消費品。在銀行方面，爲了『強迫儲蓄政策』（減少通貨膨脹），也愈來愈加獨立了。銀行傾向於實行『自己的政策』，即依照自己一家營業底底盈來規定利率，而非同以前那樣全國利率一律了。如此下去必然在投資政策上發生差等，更進一步去瓦解蘇維埃經濟。

經濟上親資本主義傾向加強，政治上反動傾向自然跟着抬頭了。戰爭初起時，史大林已不得不對軍官們讓步。政治委員廢除了，指揮統一了，軍官權利擴大了（就地槍斃逃兵之權在內）。以後，軍隊中愈來愈不平等。軍官和士兵食宿分開，餉額之差異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戰爭中，教堂重開了，而且受政府保護了。流亡國外的白黨取得蘇維埃公民資格了。沙文主義宣傳代替社會主義宣傳了，俄國歷史上的皇帝和將軍，過去被斥爲民衆劊子手的，現在被尊奉爲英雄了。至於第三國際解散，『國際歌』爲『蘇聯國歌』所代替，以及最近『紅軍』改稱『蘇軍』，更不必說。

蘇聯國內這種親資本主義的傾向，自然是能够與國外包围的帝國主義相呼應的。帝國主義者也熱烈希望蘇聯國內這種傾向能迅速長成，根本破壞十月革命遺下的經濟基礎。

從國內兩方面看來，現在我們明白，蘇聯表面上雖然抬高國際地位，雖然擴大領土和勢力範圍，但比戰前更加削弱，更加陷於危險境地，更加需要保衛了。

### 史大林怎樣保衛蘇聯？

史大林領導的官僚階層也已看出了蘇聯內外的危險，但其應付的方法是沒有根本效力的。

情緒，也有同樣的作用。同樣的因素，起初激起了怨望，激起了反抗意志，過了某一點就造成麻木和癡呆了。我們也可以拿同樣的話應用於其他因素，咱們起初是加速『民族團結』之瓦解過程的，結果則不僅瓦解了帝國主義國家，而且瓦解了社會生活和階級凝聚。

還有一個很重要因素，即對德戰爭之延長造成的客觀影響。城市中心被重大毀壞了，勞動人口分散了（當德國投降時，大多數城市人口不及戰前百分之五〇，甚至不及百分之三〇），例如柏林人口祇剩一百五十萬或二百萬，弗蘭克福人口祇剩二十五萬等等），大多數工人被動員而加入軍隊了，工廠工人成分變複雜了（大多數是外國人，戰俘，女人和小資產階級分子。）

最後還必須算入帝國主義宣傳和史大林主義宣傳之有害的影響。這些宣傳，雖然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有使德國工人與希特勒『團結』之影響，但確實置德國工人『於鍋底和爐火之間』，讓他們除了『無盡的恐怖』之外望不見甚麼前途。

試把以上所說總結一下：當爆發革命運動之客觀的前提大多數已在戰爭過程中產生出來時候，卻有一個因素缺少：主要的因素，即鎮壓機構之削弱。鎮壓機構沒有削弱，於是，戰爭發展下去，其他的前提就不是促進成熟過程，而是促進瓦解過程了。達到完全成熟的革命運動，其一切客觀的前提集中於某一頃刻，如此才能發生爆炸，不管有無主觀因素（革命黨）存在，——這個集中，正是德國所缺乏的呀。

### 意國和德國：一個有意義的對照

我們是說那些主觀條件（十二年納粹恐怖之結果）僅有次要的意義麼？不是的！在革命運動爆發

他們應付外來的危險，自然不用蘇聯初期的世界革命政策了，也不用後期的聯合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反對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了；他們用的是一種新政策：設立外國地帶。這就是說，在蘇聯邊境和美英帝國主義根據地中間各方面設立一個地帶，由紅軍佔領着。蘇聯底外交政策首先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在德黑蘭會議上，史大林提出這個要求，想以『和平的』方法得到牠，即想取得他的帝國主義『盟友』底同意。羅斯福和邱吉爾明知戰爭結果，紅軍將受更大的損傷，蘇聯將漸漸削弱，那時將更容易對付，於是就同意史大林底要求，允許給他很廣闊的『勢力範圍』：波蘭，德國東部，多瑙河諸國，希臘以外的巴爾幹諸國，滿洲，以及內蒙。

紅軍起初開入這些外國地帶時，革命運動起來迎接牠；工人佔領工廠，成立工廠委員會，農民佔領土地，但是蘇維埃官僚害怕革命，正不減於帝國主義者。官僚們不僅不支持羣衆底革命行動，反而幫助當地的資本家去恢復法律和秩序，或用武力（如在波蘭），或用欺騙（如在捷克）。此外，官僚們又把這些地帶底物資搬運到蘇聯去，使受了戰禍的民衆更加陷於困乏。於是當初歡迎紅軍來的人，都失望了。

紅軍并非來解放這些國家，并非來發動革命，來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不過是從純粹軍事的意思來建立外國地帶罷了。但這個政策是無用而又犯罪的。純是無用的，因爲在航空發達，原子彈出現的時代，外國地帶是不能保衛蘇聯的。靠外國地帶來抵禦原子彈，正如靠大刀來抵禦坦克一般。牠是有罪的，因爲牠使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衆對於蘇聯感覺失望，把蘇聯看做同帝國主義國家一般。如此說來，牠不僅不能減輕外來的危險，反而增加外來的危險了。

官僚們應付國內的危險，便是用新的五年計劃（第四次）來阻止親資本主義的獨立傾向，又用新的『肅清』來制裁這個傾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現。

大家知道，第三次五年計劃未曾完成，德蘇戰爭就爆發了，而第四次五年計劃至今今年春天才提出來，這中間是斷了好多年的。上面已經說過，計劃斷絕期間，獨立傾向如何在農業，工業，金融諸方面漸漸加強，將陷蘇維埃經濟於瓦解了的。現在新的五年計劃實行了。可是我們檢查一下，也可以看出蘇聯經濟經過此次戰爭是如何削弱了的。下面是上次計劃和此次計劃所定五種重要生產之比較：

生 鐵	鋼	鍊 鋼	煤	油
一九四〇年實際生產	一五、〇	一八、三	一五、〇	三一、〇
一九四二年預定生產	二二、〇	二八、〇	二一、〇	四八、〇
一九五〇年預定生產	一九、五	二五、四	一七、八	三五、四

單位：百萬噸

時候（即在革命之第一階段），主觀因素是沒有如在第二階段那麼決定意義的。但她仍有很大的作用，即仍能使革命過程加速，或使之普遍化。牠可以代替許多缺少了的客觀前提，而致使第一個革命潮早點勝利，即使沒有其他一切前提亦能勝利。無疑，德國若有一個強大的革命黨存在，則德國工人和外國工人必會形成一個整體，而差不多因一切大工廠糧食問題而爆發的罷工亦必能因此迅速展開。兵士之中若有一個革命組織存在，即使比較小些，也是更加重要的。這樣一個組織必能於七月二日流產的政變時候，激起國防軍大暴動。主觀的因素能輸入新活力於客觀的前提之內，革命運動，即使在上述的轉捩點之後，亦能够勝利的。

他方面，若是主要地拿沒有主觀因素來說明德國沒有革命，那也是絕對錯誤的。我們試拿意國來同德國對比罷，就可以看出，即使法西斯統治了二十年，即使『社會主義傳統』更多『消失』，即使革命組織乃至全國性的反法西斯秘密組織蕩然無存，也是不能夠阻止客觀前提所決定的革命運動之爆發的。

不錯，德國和意國有好多差異點，是我們理解這兩國事變發展不同過程時所必須注意的。納粹政制完全摧毀了一切反對中心，連資產階級內部的反對中心也不能存在。莫索里尼政制則未曾到如此恐怖後果。納粹政制嚴密統制了全部國家軍事的，警察的和行政的機構。在意大利，則軍隊高級幹部，貴族，密切聯繫於薩伏衣王室，高級教士密切聯繫於梵蒂岡，——二者以同等程度免除法西斯統制。在德國，納粹組織許多方面都超過了意國組織（在糧食，教育，宣傳等方面）。但所有這些都是量的差別，并未能改變這兩國局勢底基本共同性：羣衆沒有自己的組織，就不能對抗恐怖政制！這些差別

上表中，一九四〇年實際生產數字是根據官方統計的；一九四二年為第三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因戰爭未實行，數字是計劃初訂時預定的；一九五〇年則為第四次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數字則是現在預定的。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即使五年以後完全依照計劃實行了，除煤炭之外其餘四種的生產，與戰爭前實際生產相較，增加得很有有限。五年之後拼命增產結果，也不過趕上戰前水平罷了。於此可見，現在，今年，蘇維埃經濟是如何遠落於戰前水平下面了。但五年計劃之恢復至少能阻止經濟上親資本主義的獨立傾向麼？我們還不敢說。

政治上的制裁則已轟動世界了。首先，以史大林為中心的官僚機構更加強大起來，表現「左傾」，即打擊少壯派軍官及愛國主義思想。上面已經說過，戰爭初起，史大林對於軍官的種種讓步了。戰爭中，黨對於軍的統制，似乎大大鬆懈。可是戰後，黨又恢復其對於軍的優越地位了。新改組的蘇維埃政府中，沒有一個少壯軍官，僅有的兩個軍官，伏洛希洛夫和布登尼都是革命和內戰時期留下的老頭子，至於那些「戰爭英雄」，則都被派往外省去，不使之影響政治生活了。進攻柏林的總司令朱可夫元帥被免職，派去奧德薩當小軍區副司令。空軍司令維諾可夫元帥也被免職了。

這個制裁反映到思想上的，就是愛國主義宣傳突然停止，而恢復了史大林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許多報紙雜誌被勒令停刊，為了過分歌頌帝制時代的史蹟和英雄。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特別的議決案，「斥責這種惡傾向。」藝術方面，歌舞，音樂，戲劇，繪畫，電影，建築，也受了斥責。攝好的電影，「可怕的伊凡」，被禁止放映了。跟着斥責來的是「肅清」。若干政府機關，以及若干生產部門，都有負責人已被免職，逮捕或處刑。現在還在進行中，不知將來如何地步為止。

但「肅清」運動，不僅是對付右派，那些親資本主義的分子，而且是對付左派，對付那開始覺醒的羣衆。史大林每次加強其壓迫機構時總是左右同時打擊的。

關於蘇聯羣衆開始覺醒的消息，自然難得透露出來，但我們從檢查過的消息也可看出端倪。例如有兩件未被檢查掉的瑣事是很富於意義的。

一是某次加里甯到一個羣衆會場演說，有個女人站起來問他道：「我們赤腳走路，或穿蘇維埃的鞋子，你爲甚麼有那麼光亮的皮鞋穿？」  
二是雅洛斯拉夫汽車廠開全廠大會選舉工廠委員會主席時，舊主席落選了，雖然有官僚工會替他撐腰。新選的主席立即被官僚工會免職，而且受了極嚴厲的批評。但重選時，工人還是選舉他，不選舉工會提出的舊主席。

羣衆覺醒是不足爲怪的。戰時，有幾百萬蘇維埃公民第一次來到西歐，看見了資本主義世界。他們發現別國人民生活得比他們更好些，別國勞動生產力比蘇聯更高些，於是明白落後的俄國是不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的，必須得到諸先進國家援助。蘇聯領導者必須擴大世界革命於其他的國家，「一國社會主義論」則是封閉世界革命道路的。同時，又有幾百萬人，在國內忍受種種痛苦和犧牲，現在戰爭停止了，蘇聯勝利了，他們以爲從此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享受勝利底果實。對這兩部分人，史大林祇有給與失望。他們將爲失望而起來鬥爭。

也許可以解釋巴多里奧政變爲甚麼能成功，而史陶芬堡政變爲甚麼會失敗，卻決不能解釋意國羣衆爲甚麼能於莫索里尼倒台以前幾個月舉行大規模罷工，而德國罷工運動則未曾超過孤立而參差的行動階段。

因客觀前提漸漸消耗而致德國沒有革命；其他歐洲國家祇有參差的，散碎的，原始性的革命運動；但許多中心仍能創立雙權政制核心，雖然爲了其孤立的性質，很快就被別人撲滅了；——以上便是歐洲革命第一階段底特性。(完)

唐盛譯自比利時出版的「工人鬥爭」

上月底，經濟團體開聯誼會，十餘位經濟專家，以「如何建設國民經濟」爲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連久未發言的馬寅初博士也說話了。馬寅初博士是中國經濟問題第一個權威，其他發言的幾位也是有名的專家，他們的意見自然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在文匯報讀了他們的演說底記錄以後，覺得這日討論的雖以「如何建設國民經濟」爲題，但其實是討論着中國經濟前途，或如王良仲先生所說的，是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究竟走甚麼路線」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究竟走甚麼路線呢？首先發言的兩位專家伍啓元和陶大鏞（此次聯誼會是兼爲歡送這兩位專家出國而開的）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伍啓元先生認爲中國決不能走十九世紀西洋資本主義路線，即不能走自由的私人的資本主義路線。爲甚麼呢？因爲現在客觀的國際環境不同了，如果放任私人資本，慢慢地自由發展，必定跟不上他國，甚至跟不上麥克沃瑟扶持下的日本，甚至落在印度後面。中國全國國民收入現在祇

### 中國經濟發展走甚麼路線？

嚴 舒



對外，採取「外圍地帶」政策，對內採取左右兼攻的「肅清」政策，這不是保衛蘇聯的有效方法。

### 保衛蘇聯的有效方法

蘇聯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究竟是建立在十月革命遺產上面的。重要的生產機關已經收歸國有了，無產階級專政身上雖然生了官僚毒瘤，這毒瘤雖然有致命危險，但直到現在，毒瘤所寄生的母體還是活着。我們仍當盡力保衛牠。我們要保衛的是十月革命底遺產，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毒瘤。

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明顯，祇有世界革命才能阻止美國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進攻了。爲此，蘇聯必須重新舉起國際主義旗幟，必須回到列甫去，必須恢復蘇維埃民主制度。

托洛茨基很早就說過如下的話：

「保衛蘇聯，在原則上是與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一致的。我們堅決拒絕「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無知的反動的史大林主義幻想。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救護蘇聯去建立社會主義。但世界革命同時也必然要把克臨靈官寡頭政制掃蕩了去的。」

這幾句話，世界革命者決定其對於蘇聯態度時，仍然可以拿來當作指南針的。

##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上)

劉 默

### 從一個起碼的真理說起

「友乎？敵乎？」這個十年前流行一時的對日問題，現在又對美國提出來了。對這問題，中國的各色人等，有各色各樣的回答：大人先生們說，美國「頂好」，她是我們的知己；但另一些人說，美國「頂壞」，她是一個假冒爲善者，實際上是我們的死敵；有一部分人說，羅斯福才是真正的中國之友，杜魯門這庸才够不上交情；再有一些人說，華萊士是中國的朋友，貝爾納斯是我們的敵人。

衆說紛紛，莫衷一是，究竟是誰友誰敵呢？

我們覺得，這些說法都不對。因爲說這些話的人，除了少數別有用心以外，統統忘記了一個起碼真理：美國不是一個匍匐的整體，同時也不是些單獨的個人。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是由利益敵對的幾個階級構成的。美國的政治家，因此如其他國家的政治家一樣，不是各憑「自由意志」行事，而是從屬於階級，替他所屬的階級說話的。因此，我們不能說整個的美國是我們的朋友或敵人，而祇能說，美國的那一階級是中國的朋友，那一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同樣，我們不能說同屬於美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家中，某幾個當權要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某幾個却根本違反這個階級的利益。

說美國是「頂好」的，那個很少由於腦筋不清，而大多因爲利益使然，原來他們，即那些位高多金的中國統治者，其存在，及其大部分力量，是依靠着美國統治者的。說得更清楚些，他們的地位權勢，是依靠着他們推行美帝的對華政策，從而獲得存在與發展的。如此，能不說人家「頂好」嗎？此種華爾街巨賈

有幾十萬萬美金，以此來發展私人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但他聲明國家資本並非現在人們反對的官僚資本。

陶大鏞先生則認爲必須走自由資本主義路線。爲甚麼呢？因爲他認爲必須先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介紹到中國來，等到中國生產力充實時候，才能走向社會主義。

章乃器先生附和陶大鏞先生這個意見，他於陶大鏞先生所舉理由以外再補充一個理由，即是說：「歷史是有階段的向前發展；假如我們要想跳過資本主義階段走上社會主義，那是不可能的。」章乃器先生如此偏愛自由資本主義，以至提議修改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他說：「我們應多研究平均地權，少談點節制資本。」因爲「對民間放任比鼓勵官僚統制好。」

吳清友先生起來反駁章乃器先生底「不可跳過階段」說。他認爲跳過歷史階段是有先例的，他舉蘇聯境內落後小民族經濟發展做例。但說到中國經濟問題，他的結論仍舊是主張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因爲中國現在仍然是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但他補充說：中國要發展的是「新資本主義」。

最後，施復亮先生提出兩條道路，一條是改良，一條是革命。他認爲協商會議底五項決議是改良道路。「我一點也看不出社會主義來。」他認爲中國是能走這條改良道路的，因之也能發展資本主義的。

其他發言的幾位經濟專家，關於這問題，並未會超出以上諸人所說的範圍。專家們相互間雖然有論爭，但總的結論是一致的，即都認爲中國經濟發展祇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陶大鏞和章乃器兩先生明白主張私人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不必說；吳清友和施復亮兩先生也是主張資本

和我們中國的買辦之間的『頂好』交誼，不在我們論述之列。

說美國『頂壞』，看怎樣講法。如果渾統地說，那是錯的；但若將『美國』的意義了解成獨占資本家們操縱的美國政府，那當然有理。問題是要分別出當政的美國和被統治的美國來。有些人看到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所行所為，憤怒了，罵牠『壞』，稱牠『敵人』，意思中包括着整個的美國與全體的美國人。那是大大地錯了。這是偏狹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是無益而有毒的。因為我們知道，美國除了少數當權的獨占資本家及其代表們之外，還有最大多數勞動的美國人，他們非但不有意主張帝國主義，而且因為地位使然，利益對立，是根本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的。我們如真要反對帝國主義，正需要和他們攜手，不但此也，甚至非攜手不可，因為，如果得不到他們的聯絡，中國的一切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運動都必定着要失敗的。

至於羅斯福和杜魯門之間，華萊士和貝爾納斯之間，那不該勉強分出誰友誰敵來。不錯，論手段，論才能，尤其是論規模，羅斯福與杜魯門的差別不可以道里計；華萊士和貝爾納斯之間，也確實有許多政見上的不同，表面看，這些不同竟是很根本的；可是，誰假使以為那些差別和不同竟是大到這個地步：竟可以拿『民主』與『非民主』，『帝國主義的』與『非帝國主義的』名稱來加以區別，那就錯到不知那裏去了。我們得認清楚：就美帝欲使中國淪為殖民地這一根本政策上說，美國資產階級政治家中間無論那一位上台，都不會有絲毫變動的。

因此，站在中國最大多數的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上，亦即站在中國民族獨立的利益上，獨立金融資產階級的美國是決不能成為我們的朋友的（自然他們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朋友），這一階級中的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做我們的朋友，唯一地與真正地能成為中國之友的，乃是美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祇能在這一階級身上找到我們鬥爭的幫手，我們不能寄託任何希望於美國的統治階級，或這一階級中的任何一個政治家。

### 美國的工人階級

如此說來，中國革命前途既然和美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有着這樣密切的聯繫，那末中國革命分子，尤其是中國的工人革命家，自然必須明白美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誰都知道，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富強的主業基礎是空前發達的工業生產。這基礎造成了最強大的美國資產階級，同時也造成了最強大的工人階級。就目前說，美國一切經濟部門中的工資勞動者，共約六千萬人，占全體人口的二分之一弱。僅僅這個數字，就已說明了美國工人階級能起如何決定性的作用了。

不過由數量上表示出來的力，如果沒有組織起來，或者覺醒過來，那末還只是潛在的，因之不能發生積極作用。用句哲學上的話來說，一個階級的力量，祇有通過了鬥爭與組織之後，才能從『自在』的地位轉變到『自為』的地位。祇有明白地懂得了自己階級的利益，積極為這些利益鬥爭，這個階級才算是有力量。光是數量上的龐大不能就此發揮出力量來。

因此，我們要從組織與鬥爭方面來看美國工人階級。講到工人階級的組織，一個是經濟的：工會；另

主義的，雖不一定是自由的私人的資本主義；似乎當時有人誤認伍啓元先生主張社會主義，但這是冤枉了他。不錯，他提出了『社會革命』口號。他說：『無論就世界潮流看，或就國內情勢看，經濟建設必須包括社會革命的內容。』又說：『經濟建設需要朝向社會革命走。』以後，陶大鏞，馬寅初，章乃器，吳清友諸先生，都重提『社會革命』，而且都表示同意了。但這裏所謂『社會革命』是甚麼呢？是指社會主義的革命麼？是指『十月革命』式的沒收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機關歸社會公有的麼？決不是的。因為伍啓元先生稱『十月革命』基礎上建立的蘇聯經濟制度為『共產主義』。他不要共產主義。他說：『必須在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選擇一條路。』他說美國現在也要走上這條道路。這條道路不是別的，正是他所憧憬的『國家資本』，亦即是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乎？）之最高的表現。

把英國工黨政府下的經濟和蘇聯的經濟視為一類，是錯誤的。把這兩個國家底『國有化』視為祇有量的差異，是錯誤的。即使英國底『國有化』比現在更普遍些，更完全些，但政權若未曾轉移於無產階級之手，那些國有化的產業仍舊是屬於資產階級所有的。英國工黨主席拉斯基不久以前自己才說：英國祇有政治的民主，蘇聯才有經濟的民主。沒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資本』，仍舊是資本主義，而且是壟斷的統制的資本主義。

可見，專家們爭論的是：自由資本主義或統制資本主義的問題，決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問題。沒有一個人主張中國經濟發展應走社會主義的路線。

然而中國經濟不發展則已，要發展祇能走社會主義的路線，亦即伍啓元先生所謂紅色的急進的共

一個是政治的：政黨。現在讓我們先說工會。

### 從 A F L 到 C I O

我們不想做詳盡的歷史研究。下面的祇是一幅素描：跟着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工人階級中形成了一個工會組織，就是報章上常能看見的所謂『A F L』，即『美國勞動聯盟』。這是一個依行業為基礎而組織起來的工會。所謂行業工會，亦稱職業工會，就是依工人中之各種技術不同，如機匠，伙夫，各自組織在一個會裏，那是老式的，帶有甚深的手工業行會遺跡的。這組織天然僅限於一些上層的，熟練的，有技術的高級工人，而且性質上天然是保守的。這樣的工會組織在美國存在了數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俄羅斯的工人階級首先奪取了政權，各國工人都左傾起來，甚至革命了。但是美國，因為大大地發了戰爭財，美國的資本主義達到了空前發展的高度，正走進了黃金時代，牠賺得的錢太多了，足夠拿出一小部分來分給工人，所以大戰後的美國工人，就一般說，非但不革命，而且更加右傾了。好些工人自備了汽車，也抽起了上品雪茄，也居然有資格吃二元一餐的膳食。他們隔着大洋，遙看歐亞二洲的動盪，遠觀那邊階級間的狼狽殘殺，簡直有點不甚可信的。他們相信美國式的勞資合作是最理想。於是大多數工人不參加組織，小部分工人——特權的或前進的——則以古老的『A F L』為滿足了。一九二〇年代的初期，甚至美國盛行着一種所謂『Comrades Union』，可譯作『公司聯合會』。這會是如此組織的：資方與勞方共同參加在一個組織裏，以協議方式解決一切問題。階級合作精神是發揮到了極點。

可惜好景不常。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使這『例外的』美利堅資本主義也知道了困難。生產停滯，物品過剩，信用破產，事業停歇，工人失業……一切一切，像瘟疫般前後相繼地來了，而且一日嚴重似一日，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美國全部銀行關門，整個國家經濟陷於混亂。

這時候，美國工人階級如果本來有健全的組織，又假如有正確的革命領導，那簡直是能夠進行革命，根本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起工農政府來的。可惜如我們上面所說，那時候美國工人階級的情形不是如此。因為從來沒透著階級合作的思想，既無戰鬥組織，又無戰鬥精神；一旦從相當高的生活標準上倒跌下來，只是迷惑了，因循了，竟弄得不知所措。工人階級感染着資產階級的驚恐，也走進了癱瘓與消極的狀態。因之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這六個不景氣的年頭中，美國工人階級非但不會進行鬥爭，而且不斷地後退陷於沮喪之中。新的組織沒有產生出來，舊的組織更加是懣懣無生氣了。

趁這機會，資產階級中出來了一個有遠見有手腕的政治家——羅斯福，他用大規模的改良方法克服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使美國的資本制度從一九三五年起又走上了恢復之路。工人階級也從危機的打擊之下清醒過來了，恢復了自信。不過六年痛苦畢竟不是白過的，工人們這一次的自信，跟危機以前的却大大不同了。以前，他們相信美國的繁榮，以及附在這繁榮身上的階級合作制度是無窮極的；現在，他們可沒有這個夢想了，他們見過了危機，嘗到了危機的痛苦，看見了資方在危機中『破壞合作』的情形，他們於是懂得：要想保障工人生活的水準以及更謀改善之道，必須自己組織起來。這個覺醒使成千成

產主義的路線。

主張自由資本主義的陶大鏞和章乃器兩先生一定反對這個路線。章先生一定要說：『跳過資本主義階段，是不可能的。』陶先生也一定要說：『資本主義生產力尚未充實，中國怎麼能夠走向社會主義？』

我們可以同吳清友先生一般舉出實例來證明從前資本主義階段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跳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蘇聯既然能夠幫助牠境內的小共和國做這跳躍，為甚麼不能夠幫助中國這個大共和國做這跳躍呢？但我們無須借助這個論據，因為中國畢竟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畢竟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即使現在走上社會主義也已經不能算『跳過階段』了。難道章先生以為中國現在還未曾到資本主義階段麼？難道官僚資本支配一切的國家還是在前資本主義階段麼？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尚未充實，——這話自然是沒錯。論生產力，中國不僅不如美國遠甚，而且不如日本，要趕上日本不知還需多少年。但問題乃在於資本主義路線並不能發展生產力。僅僅拿中國一國來看，拿中國從世界歷史割裂出來看，資本主義固然尚未耗竭其發展能力，可是在世界範圍來看，資本主義已經耗竭其發展能力了，中國是不能如此割裂的，因此世界資本主義病症也傳染到中國來，使中國資本主義未老先衰，在孩童時代就停止發育。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官僚資本，如此難於解決的內戰了。中國要能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必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實行專政，將重要的生產機關收歸國有，以此來發展生產力。這就是俄國走的路線。

主張『新資本主義』的吳清友先生和主張『國家資本』的伍啓元先生也一定反對這個路線。吳先

萬的工人參加了『美國勞動聯盟』，使垂垂欲死的唯一的勞工組織突然間復活，使這古老的職業工會內部紛紛成立產業性的工會支部。

產業工會是以整個產業中的全體工人為組織單位的，沒有行業的限制，因之沒有階層，沒有特權，所以是羣衆性的，不保守的，遠較戰鬥的。自從一九三五年起，產業工會的組織相傍着舊有的職業工會發生出來，共處在『美國勞動聯盟』之中。二者進行着激烈鬥爭，互爭這個組織的領導。美國那個最保守的閉關的階層性的勞工組織，於是發生了沸騰的內部生活，充滿着活氣了。鬥爭結果，美國勞動運動史上揭開了新的一章：一個純粹依產業區別而組織的工會產生了，這就是所謂『CIO』，就是『產業組織大會』。這是以原本隸屬於『美國勞動聯盟』的一些產業工會為基礎而組織的。

這個新的組織，在一九三五——三七年短短兩年間，獲得了與『美國勞動聯盟』相等的聲勢，而後者却是經過了數十年的長成，才達到這個地步的。產業工會運動發展得如此之快，那是經過了許多次激烈鬥爭的，牠一方面要反對保守的工會官僚，另一方面又得反對頑固廠主們的彈壓。不懂得工人運動史的人是不會明白的，為什麼美國工人從職業工會的形式走到產業工會的形式要用如此大的力氣。美國工人，不僅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就是在在一九三四年，一切組織產業工會的企圖都是失敗了的。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職業工會實質上是少數貴族工人的集團，是資方控制工人羣衆的工具，而產業工會却是羣衆性的，較多獨立性的，所以是十分不利於資方的。如果職業工會的大部分作用在於促進勞資合作，那末產業工會則主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美國的資本家與工官們十分懂得這一點。所以多方壓制後一形式工會的發生。

但是美國工人們畢竟衝破了一切難關。龐大的產業工會組織終於成立了。不但這一點，他們還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採行了靜坐罷工的方法，開始在鬥爭中否定資本家對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從那時候起，這個『CIO』，不但在美國產業中，甚至在政治上，也成爲一個重要因素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總統的二屆連任，大大地得力於『CIO』的支持的。數量上占着極大優勢的美國工人階級，這時因爲一個較有戰鬥性的組織之產生，開始積極地發展出力量來了。這力量不但使他們能在經濟轉機時期爭取勝利，而且能使他們在重入衰落的時期保證這些勝利。我們知道，美國的經濟危機在一九三四年以後略有轉機，三五，三六及三七的上半年是相當景氣的年頭；但因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在走着下坡路，美國雖擁有巨大的國富可資調度，也祇能和緩這趨勢於一時期而已。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工業生產又陡然下降了。這時資本家想用壓榨工人之法來彌補這個損失，但是遇到了堅強抵抗，不得不適可而止了，工人階級仍然保持他們在兩年中爭得來的成果。這大部分是要歸功於『CIO』的力量。

不過這時候的『美國勞動聯盟』經過了鬥爭與分裂之後，也大大地年青化，羣衆化，因而左傾了。牠內部也包含了許多的產業工會。

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大組織之外，還有十一個單獨存在的極其保守的『鐵路員工聯誼社』，包含着數十萬工人。

這便是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工人階級的組織情形，在一九四〇年，上面所說的三個工人組織，包括了一千多萬會員。這些人是美國無產階級的骨幹，因為他們都是產業工人，是被僱於獨占資本所

生一定要說：『中國目前仍然需要資本主義階段，因爲中國現在仍然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伍先生也一定要說：『國有化』就夠了，何必無產階級專政呢？

即使我們承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爲甚麼需要資本主義階段呢？吳先生自己說過歷史發展有跳過階段之可能，但要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怎樣。那麼中國有甚麼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使牠不能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呢？吳先生那日沒有說，至少記錄上沒有寫下他的話，我們無從知道。我們要說的，就是不僅自由資本主義已在中國耗竭其可能性，一般資本主義，以及甚麼『新資本主義』也已在中國耗竭其可能性了。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仍舊『拖』下去，那麼唯一『可能的』資本主義，就是那日諸專家所指责的『官僚資本主義』，決不是『自由資本主義』，也不是『新資本主義』。

至於政權沒有轉入無產階級之手的『國有化』，仍然是資產階級所有，——這話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們姑不說英國以及其他若干歐洲國家現在所行的『國有化』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祇要說這種『國有化』在中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現在官僚資本底擴大。官僚資本下的『國有化』，就是美國獨佔的殖民地經濟。

其實，在中國經濟問題上，僅僅討論『走甚麼路線』問題，是不够的，必須討論『誰』來發展中國經濟？『甚麼階級』來發展中國經濟？在『甚麼政權』之下發展中國經濟？

中國如果不經過革命，政權仍舊操在資產階級之手，則無論如何不能擺脫殖民地地位。在此情形下，即使經濟有發展，那也是爲了美國帝國主義利益，而不是爲了中國獨立的資本主義利益，更不

屬的一切大企業中的。所以就表面看，他們雖祇佔了全部工人的六分之一，但就地位重要說，他們的行動不僅決定着全體工人，而且影響着全國人民的經濟活動。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時候已經完全組織起來了，他們已從『自在』的階級，最後與完全地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了。

### 美國工會主義的弱點

那末爲什麼還不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呢？那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因爲這些工會，連最進步的『CIO』在內，都仍受着狹隘的工會主義的束縛；第二因爲美國工人階級，雖然已感覺到以組織力量從事生活鬥爭的需要，但是尚未覺悟到經濟鬥爭之最後勝利，需要靠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勝利來保障。工人階級本身的此種覺醒程度，又決定了工人政黨的成熟程度；美國至今還不會有一個決心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羣衆性的黨。

這裏還是先談工會方面。『美國勞動聯盟』與『鐵路工人聯誼會』是不必說，這兩個傳統的工會，嚴格地限於經濟立場，他們絕對地不談政治，更不願意談革命的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過了數十年的演化，他們本質上已成了美國整個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機構。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人們有很大理由說，他們的存在祇是爲了圓滑地推進資本主義，爲了促成勞資雙方的『忠誠合作』。更說得清楚一點，祇爲了把一些高級的與熟練的工人組織起來，分取資本家的超額利潤，藉此防止廣大工人羣衆的不滿與反抗。所以這些組織與其說代表工人利益的，毋寧說是經過他們來收買小部分上層工人，由此可以蔑視多數下級工人利益的。這樣的工會既然與資本主義的利益相一致，自然希望這個制度能够永遠存在下去，自然不歡喜一切以根本推翻資本制度爲目的的政治理想與活動了。

不必說，這情形是以美國資本主義的上昇期與繁榮期爲背景的。要有這樣的工會，美國的資產階級必須有驚人的利潤可賺，以致不惜拿出一部分來分給一部分工人。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而在大恐慌發生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的五年不景氣中，『美國勞動聯盟』之驟趨削弱萎縮，也正因爲暫時間失去了這個背景。

『產業組織大會』發生於美國資本主義遭逢了空前大變之後，正是這個大變的產物，按理牠應該一反乎美國工會的傳統精神，能衝破改良與合作的桎梏，大踏步走向政治鬥爭乃至革命道路了；可是不然，牠雖然在基礎上羣衆化了，組織上產業性了，同時在精神上，也確實具有很大的戰鬥意味，但主要因爲美帝國主義的『有生力量』太大了，牠雖然經歷了嚴重危機，却仍有餘力從事於極大規模的改良，羅斯福的新政便是美帝改良政綱的實施。根據這個政綱，政府動用了美國資本主義數十年積聚下來的龐大財富，舉辦公共工程，解決失業危機，改善勞工生活，提高大眾的購買力，藉此重振了國內市場；相當恢復了生產，緩和了羣衆的左傾，同時又網羅了勞工領袖，使他們與政府發生密切關係，使工會成了半官機關，結果，羅斯福便以『勞工之友』的姿態控制了整個的美國工人階級。

如此，美國工人運動的主流，雖然藉八恐慌之助，衝出了保守與特權的職業工會的藩籬，向前走了大大步之後，却跌進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陷阱中去了。

(未完)

是爲了中國工農羣衆利益。試看日本在台灣，在東北，在其餘各省的投資，都由中國接收了，中國經濟基礎突然豐厚了，但甚麼人得到了好處呢？

中國即使經過革命，但假如政權操在所謂『民主階級』（從工人，經過農民，小資產階級，以至民族資產階級）之手，則經濟仍是不能發展的，因爲這種政權不能穩定下來，不能給經濟發展以一致的方向。惟有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專政，才能構成一個穩定的政權，才能解除中國經濟發展上種種障礙，才能使中國經濟有利於工農羣衆。

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經濟，不管生產力是否充實，『不管『國有化』到甚麼地步，總是走上社會主義路線了。

由此可見，『誰』來發展中國經濟問題解決，則『走甚麼路線』問題也跟着解決了。經濟專家們固然好多人知道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能分開，但至今祇能泛論一般『民主化』，而不能提出甚麼階級來主持這『民主化』問題，所以他們祇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兜圈子，祇限於爭論自由資本主義和統制資本主義孰優孰劣問題，而看不見唯一可能的發展路線，即社會主義路線了。

羅斯福底兒子回憶開羅會議時一件軼事。他會見了蔣夫人宋美齡以後，有了一種印象。當他拿這印象告訴他的父親時候，老羅斯福回答他道：『我想，我不會同你一樣用那些分量重的字眼。她是一位機會主義者，那是毫無問題的。我當然不願在她的國內護人以為我是她的敵人。中國必須能繼續作戰，牽掣住日本的軍隊。誰還能替代蔣氏夫婦呢？不管他們有多少短處，我們仍得依靠蔣氏夫婦。』由此可見我們的盟友比我們自身更加需要我們對日本繼續抗戰哩。

# 中國革命悲劇

(續)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威 譯

新 旗 第十期 14

在中國中部和北部，要求增加工資，組織工會和集體契約的鬥爭，也開始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京漢路工人底鬥爭，結果造成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鄭州的屠殺。北方軍閥曹錕吳佩孚命令他的兵士武力解散工會會議。六十個工人被屠殺了。但這個壓迫不過暫時抑止鐵路工人成立全國組織的努力。差不多一年之後，全國鐵路總工會仍舊成立了，舉出一個委員會來指揮鬥爭，『以改善我們的條件，敬重我們的地位，教育我們自己和兒女，要求組織個別工會的權利，團結一切鐵路工人。』

在上海，一九二三年初已經有四萬工人組織在二十四個工會裏面了。戰線很迅速展開了。一九一八年祇有二十五次罷工見於紀錄，參加者不到一萬工人。一九二二年，祇有九十九次罷工，參加者全國共有十五萬工人了。運動底速率和戰鬥性發展得都很驚人。一九二四年勞動節，上海街上有十萬工人示威，廣州街上有二十萬工人示威。當時的報告說，武昌，漢陽，漢口，雖然有嚴厲的戒嚴令，工人區域仍有紅旗飄揚。勞動節傳統的口號，『八小時工作制』，激動了那些工人，他們剛在開始夢想十四小時代替十六小時，十二小時代替十四小時，十小時代替十二小時哩。

那日的傳單說：『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讀書和娛樂，八小時休息，——是何等合理呀！工人階級爲了實現這個要求，已經流了四十年的血。工人做老闆奴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老闆非革命不肯讓步麼？好，革命就會到來的！』

『工友們，今天要記得我們也是人，同老闆一個樣。我們要求老闆拿我們當做人看待。組織起來！人多就有力量！各地同志將給我們援助！』

工人在街上示威唱着新歌：『將來做工是快樂，是我們對於人類的貢獻。自由鐘召喚我們去工作。手攜着手，來唱『工人萬歲！』』（譯者按，這歌以及傳單的文字，都無法找到原文，祇好從英文譯出了。以前以及後好多地方，凡引用原文之處，我們無法找到原文的，都祇能從英文轉譯。）

顯然可見，當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崛起了，已經在鬥爭之中組織起來了，而此鬥爭也已表現英勇犧牲精神了。無產階級也已經具有健全的精神，對於資產階級『同盟者』抱持懷疑和不信任，不幸，這個精神很快被國共同盟底要求所壓制了。一九二四年勞動節，孫文告訴廣州工人說：

：『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就在於外國人僅僅受本國資本家所壓迫，而不受他國資本家所壓迫。……中國工人則尚未曾受中國資本家所壓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家所壓迫。』次月在廣州開的太平洋運輸工人第一次大會上，國民黨演說家也說了類似的話。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G. V. Kiselev）即伍廷康）關於此次大會寫道：『中國鐵路工人代表秘密跋涉幾千里來開會，他們還新鮮記得京漢路罷工流血事件和本年勞動節工人被槍殺事件，他們以及爪哇同志構成了大會底左翼。他們以冷淡和懷疑迎接國民黨負責代表底演說，因爲這位代表號召工人與農民及知識分子聯合戰線，但非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爪哇同志也曾於去年五月間實行一次嚴重的鐵路大罷工，而且於泛回教團體的聯合戰線，但須在真正的革命組織領導底下，其中只有充分的共產黨影響。』魏金斯基在未來約東中國勞動運動使受資產階級領導的工作上將有很大的作用，他和他的朋友不久之後就要教中國工人怎樣迎接國民黨負責代表才算合適了。

農民也已開始鍛鍊其自己的組織武器了。現代中國農民運動是彭湃在廣東東江海豐縣所發起的。彭湃是中國革命中最顯著的和最勇敢的人物之一，他本是海豐大地主底兒子，在本縣小學當教員，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有他在內，不久他就圖謀拿共產主義思想在農民中開闢道路。爲了一九二一年勞動節領導他的學生舉行示威原故，彭湃被當局革職了，於是到鄉下去，進行組織農民工作。這裏，他起初遭到的挫折，挫折後的成功，以及海豐農民協會初期的鬥爭，種種故事，他會以個人日記和回憶形式寫成一本極有價值的書。農民起初懷疑他，不信任他，——他不是大地主底兒子麼？——最後，有幾個青年農民被他鼓勵起來了。彭湃和他的小團體，靠一個留聲機，幾篇演說（關於如何從地主壓迫底下獲得自由的演說）和若干詭計之幫助，居然獲得了農民底信任。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以後，就迅速發展，但立刻得到砲火洗禮，因爲陳炯明部下的兵士就來進攻。

海豐農民如此組織起來，很快就把運動擴展於鄰近諸縣。一九二三年夏天以前，廣東省農民協會概數已建立了。這個新團體有一篇宣言說道：『地主底土地并非真是拿錢買來的。現在地主底父親或祖父是用暴力從農民搶來土地的

。即使土地是買來的，地主不過付一次錢，但他每年收租，他可以收幾百年，幾千年的租。……地主沒有做甚麼工，但取去了每年收租底最大部分。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土地上費去了多少金錢和汗水呀！……這些是簡單的話，但說出了那種狀況，那種被人視為一成不變的，上天所定的狀況。當農民協會宣傳可以由自己努力來改變那種狀況，而且用事實證明的確可以改變那種狀況時候，世界好像換了一副面目。上天好像拿同一笑面對待農民和地主。這些思想如此迅速浸透鄉村，正如雨水浸透泥土一般。這些思想也很快結了果實。農民起來鬥爭，反對地主，反對官府，警察和軍隊；鬥爭普遍於東江各縣，而且蔓延到西江和北江去。減少田租的要求幾乎立即就達到完全取消田租的要求。一九二三年，高要縣，已經有些加入農民協會的佃農拒絕交租給地主了，地主不得不請求軍隊和警察協助收租。……每次收租都有武力衝突發生。農民運動發動了。一九二四年，當國民黨改組時候，農民運動已在天踏步前進了。

共產黨帶到工廠和農村來的國民黨綱領，在工人和農民看來，總是一種機會，可以經過戰鬥的組織來改善生活條件的。工人和農民很自然地吧國民黨底敵人當做自己的敵人。這種敵人還很多，必須打擊和剷除之後，國民黨才能成爲一種真正的統治力量，不僅在廣東全省，而且在廣州一城。一九二四年夏天，國民黨在廣州的統治遭遇『商團』挑戰，『商團』底經費和軍火是英國帝國主義者以及粵港兩地殷實買辦所供給的。英國在遠東的最大金融機關匯豐銀行底大買辦陳廉伯，就是『商團』組織人。八月十日，孫文扣留了陳廉伯一船軍火，經過了幾次動搖和拖延之後終於決心要剷除這威脅其統治的武裝團體了。

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給孫文一個奧德美敦書，說：『如果攻擊『商團』，英國海軍就要干涉。孫文向當時工黨首相麥克唐納提出抗議，麥克唐納不回答，——這就證明工黨所預許的改良是不適用於英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孫文又打電報給國際聯盟，可是這個世界和平組織不懂得這件事情與牠有甚麼關係，所以也沒有回答。最後，十月間，黃埔軍官學生和工農武裝隊伍組成的一種軍隊向『商團』進攻，經過短時而激烈的戰鬥之後打敗『商團』而解除其武裝了。珠江上的英國砲艦并未曾實行其威嚇的話。』

四個月之後，一九二五年二月，陳炯明又要進攻廣州了，當時廣東省內還有很大部分在他的武力支配之下。國民黨軍隊於是打進東江陳炯明巢穴去。爲了海豐，陸豐，惠陽，五華諸縣農民底活動，陳炯明束手無策；他的後方被農民攻擊了，他的交通線被農民截斷了，他的軍需品被農民劫奪了。東莞，霞坪及鄰近諸縣的農民，與國民黨軍隊並肩作戰或充當嚮導，間諜，運糧隊員

。陳炯明無法抵禦這種攻擊，他不得不縮回來而放棄了進攻廣州的計劃。

一九二五年勞動節，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第一次廣東省農民協會同時在廣州開會，表現了工農運動底龐大發展。勞動大會代表共有二百三十人，代表中國各大城市五十七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協會，則僅二十二縣有組織，但已有代表一百七十七人，代表了十八萬有組織的農民。工農兩會代表，連同幾千廣州工人以及郊外來的農民，這一天在掛滿國旗的街上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農團結的大示威。他們帶着胼胝的手足和棕褐的面龐，走入廣州某幾個中小學校佈置的會場內去，那是給他們十日會議用的。學生和政治工作者來他們的會議上演說。他們第一次聽說有新式的機器能減輕他們的勞動。他們參觀了課堂和圖書室。他們第一次瞥見了那個世界，幾百年出力和流汗，把他們無情地從那個世界隔離了。

幾個星期之後，廣州街上又有槍砲聲了。那時廣州還是在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軍事統治之下，這兩個將軍，同其他好多軍閥一般，希望同國民黨合作能得到利益。可是他們和羣衆運動之間的鴻溝太深了，無法妥協。黃埔軍官學生和武裝工人又一次並肩作戰。結果是預先注定了的。滇桂軍被擊潰了，將軍們退出廣州了，西江農民又起來解決敗殘隊伍，經過江屯一次短時而激烈的戰鬥之後，楊劉勢力就完全消失了。恰在此時，新的雷聲又從上海發出來。羣衆運動高潮開始了。

上海工人發動了鬥爭，反對當地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尤其紗廠裏的條件。一九二五年初幾個月，一連串的大罷工是爲了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工頭打人的，尤其日本廠裏的工頭。青島罷工工人被槍殺以及上海一個工人被日本工頭所打死，遂使羣衆氣憤爆發出來。學生和工人在上海街上聯合示威，抗議。好多人被捕，示威者於是羣到巡捕房來，要求釋放。一個英國捕頭驚惶失措，下令閉槍，示威者中槍死了十二人。這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的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了迅雷一般的影響。上海，這個帝國主義根據地，連同其中外國銀行和外國工廠，都因大罷工而癱瘓了，外國人家中的男女僕役也加入了罷工。同巨人覺醒來一般，中國工人站立起來，使得雇主們（中國的和外國的）心中感覺恐怖，而且震動了海外帝國主義政府公事房。傲慢的外國人，幾十年來習慣於將中國工人看做污穢而馴良的畜牲的，現在眼見羣衆崛起，伸出有力的拳頭在他們面前時候，不禁面容失色了。罷工如此普遍，以致『外國人除了加入商團服務之外，沒有別的事情好做。』

罷工是普遍全國的。根據某研究者搜集的不完全的統計，接着五月三十日

屠殺之後，南至廣州香港，北至北京，共有一百三十五件罷工，參加的將近四十萬人。上海屠殺之後不久，漢口和廣州也發生屠殺。在漢口，六月十一日，英國水兵登陸，向示威工人開槍，殺死八人，殺傷十二人。在廣州，英國輪船雇用的中國海員，六月十八日實行罷工；三日之後，香港和沙面（即廣州的外國租界）所有外國行家用雇用的中國工人事實上罷工了。六月二十三日，學生，工人，以及黃埔軍官學生，在廣州街上舉行示威。當示威者經過沙基路橋時候，租界那邊英法機關槍手便向示威者開火，殺死了五十二人，殺傷了一百七十七人。外國人事後辯護說是示威者先向他們開火的。他們很難證明，因為開火時正在過橋的羣衆完全是沒有武裝的學生和工人，此外，外國人祇死了二人，而死於機關槍下的中國人則有五十二人。

人們立即宣布大罷工，抵制英國貨。香港，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要塞，束手無策。沒有一個輪子轉動。沒有一包貨物搬移。沒有一隻輪船啓碇。十萬以上香港工人實行一種空前的舉動，退出香港，羣到廣州來。這個使外國所有工商業活動爲之驟然停止的大罷工，從香港和沙面重要的工商業中吸引了二十五萬工人出來。在廣州，工人肅清了賭場和烟館，拿這些房屋做罷工者底食堂和宿舍。二千工人組成了糾察隊，在香港和沙面周圍佈置一條不可逾越的封鎖線。運動極有組織。每五十個罷工者推舉一個代表參加「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大會又推舉十三人爲一種執行委員會。在這個工人階級組織，中國第一個蘇維埃胚胎監護之下，設立了一所醫院和十七所學校，替男女工人及其兒女服務。又有幾個特別的委員會，處理基金和捐款，拍賣沒收來的貨物，掌管文書等等，此外還有一個罷工者法庭，審判那些破壞罷工或擾亂公安的罪。

警察和司法職權，交付於糾察隊，糾察隊以無黨階級特有的迅速和謹慎行使了這二個職權。糾察隊封鎖線嚴密得如同銅牆鐵壁。一個外國觀察者寫道：「廣州抵制英國貨的運動是一個罷工委員會主持的，委員會指揮糾察隊去阻止偷漏。……廣東全黨，凡貨物運輸道路，都有糾察隊把守，經過的貨色都要打開，往來的人都要搜查。……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要搜查。……罷工工人禁止一切物品，連食物在內，進入沙面或從沙面出來。……違犯此禁令的人，則由罷工法庭判罪。……這個抵制運動是做到十分完全的。……我們應當把這個抵制看做對香港和英國的一種戰爭，把糾察隊看做實行此戰爭的兵士。此外就沒有理由解釋如此完全如此無情的抵制了。」廣東沿岸以及一切港口交通線防守工作，是得到農民協會合作的。農民糾察隊巡視頭，海豐，平山及其他諸地的海岸，所以才能封鎖得如此嚴密。

沙面及其中怒憤填膺的外國人，完完全全與廣州其他部分隔離。糾察隊嚴密把守這個小租界底一切進口。租界中最必需的生活品祇能依靠香港來的船隻供給，大部分是軍艦或由外國志願水手駕駛的商船。其他城市的英國僑民也陷於同類命運。汕頭某英僑寫信給「字林西報」訴苦道：「香港必需多送點食物來，——此地沒有鮮牛奶。俱樂部是空虛的，僕役都走了。」罷工工人眼見那些驕傲的外國人，自己餓餓，自己洗衣服。在罷工條件之下，垃圾顯然不能完全清除的，所以罷工工人改名「香港」爲「臭港」；到了封鎖完全時候，又改名爲「死港」了。

香港總督叫喊道：「我們，代表文明的人，受了無政府暴徒所攻擊！」無政府暴徒「害得這些文明代表人每日損失二十五萬鎊，即中國銀元二百萬元。英國商會一個負責人報告道：「一九二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每月開入廣州碼頭英國輪船在一百六十艘和二百四十艘中間。一九二五年同一期間，則在二艘和二十七艘之間。」香港紳士們大聲叫喊，要求用武力去保衛「文明」。香港中英人士確認英國政府非出頭干涉，當地政府非有所舉動不可。……否則「廣東反赤運動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迅速的軍事行動可以「促成友好的中國人士在廣州佔得政權。」

但是倫敦政府比香港紳士們更聰明些，認爲無須直接使用英國武力就可得到「友好的中國人」來協助的。廣東全省此時似乎沒有一個軍閥或土匪頭子不會接受英國金錢，不會破壞糾察隊封鎖線或進行軍事行動反對廣州政府。然而罷工和抵制仍繼續下去。國民黨仍能在羣衆運動力量之上鞏固其政權，而且於六月底成立一個「國民政府」。九月間，國民黨軍隊，得到戰線內外農民協會協助，終於肅清東江陳炯明勢力了，無論香港給陳炯明明多少金錢和物質援助。從此至一九二五年底，廣東南方殘餘的敵對軍閥也被肅清。國民黨在廣東省內握得最高權力了。

如此，不到兩年，一個強大的羣衆運動將國民黨從政治無力的地位抬高至具有那種權力和威望的地位，敢於向一切阻礙他的道路的力量挑戰。統一了廣東省以後，國民黨就能放眼北望去估量中國中部和北部敵人力量的了。那些敵人正在驚心動魄地觀察國民黨勢力底增長。國民黨所以能够成就這一切，是全憑工人和農民底羣衆運動；而羣衆運動所以能够發展其力量和團結，又是全憑中國共產黨人底勇敢和創意。一個有力的武器鑄造成功了。如何使用牠，誰來使用牠，這些問題遂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羣衆運動撼動了中國社會一切階層了。各階級很快地重新整頓其陣營。鐵一般的階級鬥爭現實遂闖入於公開舞台（第三章完）